

# 婚姻进入的现代性困境

孙沛东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内容摘要:** 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解释人们的婚姻进入问题。将这种理论框架放在中国的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 强调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的影响, 在自变量中增加了工作单位、性观念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研究发现: 在控制家庭背景和个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 工作单位对婚姻进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三资企业工作对婚姻进入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 性观念较开放程度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具有阻碍作用。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三者与婚姻进入的关系表明中国当下的婚姻进入陷于某种现代性困境。

**关键词:** 婚姻进入; 单位性质; 性观念; 人口流动;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2)04-0082-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大龄未婚青年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线, 并日益受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剩男、剩女”, “白(领)骨(干)精(英)”“3S女性”<sup>①</sup>、“三高女性”<sup>②</sup>等一系列用来指称大龄未婚青年的词汇应运而生。出生于不同年代的青年人未婚比率有显著差异吗? 如有, 导致现代青年大龄未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主要是个人因素导致的产物, 还是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结果? 国内学术界对大龄未婚现象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试图在回顾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上述问题。

在婚姻进入问题上, 西方学者大体上有两种解释思路: 一是经济学的成本—效用逻辑, 即强调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通过资源交换实现效用最大化; 二是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比如择偶标准、婚配模式以及婚姻市场结构对婚姻进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 常用的变量主要有个人的经济能力和家庭背景。个人的经济能力通常用个人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经济收入来测量, 而家庭背景则用童年时期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两类指标来测量。从研究结果看, 学者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 有学者发现个人经济能力对婚姻进入具有促进作用, 也有学者发现经济能力对婚姻进入具有阻碍作用; 有学者发现单亲家庭的子女更可能结婚, 也有学者发

现单亲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更可能单身; 有学者发现流动人口更可能结婚, 也有学者发现流动人口更可能单身。

本文将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框架放在中国的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 强调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的影响, 在自变量中增加了工作单位、性观念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研究发现: 在控制家庭背景、个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 工作单位对婚姻进入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三资企业工作对婚姻进入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 性观念较开放程度和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具有阻碍作用。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

学者对于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对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存在分歧: 有学者认为经济独立性会提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吸引力, 从而未婚率较低; 还有学者认为, 经济独立性会降低女性结婚的动机, 并且容易在婚姻市场中由于匹配困难而单身。这两种观点都有支持的经验证据。

现代化理论和“职业进入理论”认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劳动力市

收稿日期: 2012-02-29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HZF11003);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10HZK032)

作者简介: 孙沛东(1976—), 女, 陕西铜川人, 博士, 讲师, 从事消费与时尚、婚恋与市场与国家与社会研究。

①“3S”是“seventies”、“stuck”和“single”的简称, 意指生于20世纪70年代(seventies)、被卡住进退维谷(stuck)的单身(single)女性。

②“三高”最初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 本义指“学历高”、“收入高”和“个子高”。在中国的语境中, “个子高”的含义较弱, 另增加“职位高”这一新的要素。

场参与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婚姻的经济基础会随之发生变化,从主要依靠男性向男女并重转变,男女两性在择偶标准上将会趋同,经济能力较强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吸引力会上升,结婚比率升高<sup>[1]</sup>。同时,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住房和子女养育等方面支出的增加,进一步使男性难以独立承担家庭的经济水平,女性的经济能力日益重要。男女的择偶标准开始趋同,都关注对方的经济现状和经济能力,导致高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更受男性欢迎。这种理论观点在对美国等国家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检验<sup>[2]</sup>。

另外,李煜提出的教育匹配的转型期强化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转型和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以及由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人们的择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人们为了自己和后代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会更关注对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未来的经济前景。其运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验证了该假设,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夫妻双方的教育匹配程度迅速上升,到90年代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sup>[3]</sup>。根据教育匹配的转型期强化假设,我们可以推论,在择偶过程中,女性的教育程度、职业参与和收入状况会日益受到关注,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经济能力强的女性更受男性的青睐,因而进入婚姻的比率较高。

因此,根据上述现代化理论和教育匹配的转型期强化假设,我们可以得到假设1a:

假设1a:经济独立性与婚姻进入正相关,经济独立性强的女性更可能结婚。

与此相异,其他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贝克尔的分工交换理论把婚姻关系看做是理性的行动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对婚姻市场中的男女双方来说,只有结婚的效用大于单身的效用时,婚姻关系才得以建立<sup>[4-5]</sup>。由于在家庭内部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性主要致力于家务劳动,因而,婚姻中交换关系的核心是女性用自己的家务劳动去交换男性的社会经济资源。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的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高职位、高收入的女性逐步增多。对于这些高教育、高职位、高收入的现代女性而言,结婚对它们的机会成本高而边际效用小,这会促使她们放弃婚姻,选择单身,成为主动退出婚姻市场的“不婚族”。我们把根据贝克尔的分工交换理论推导出的命题称为“经济独立假

设”,即由于高教育、高职位、高收入的女性经济独立性强,从而导致她们晚婚甚至终身不婚。学者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sup>[6-7]</sup>。

同时,根据婚姻关系中“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理论<sup>[8]</sup>,女性为了通过婚姻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通常倾向于在教育、职位和收入等方面与自己地位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因而,对自身经济能力强女性来说,她们在择偶过程中自由选择的余地较小。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在择偶过程中,男女双方遵循“郎才女貌”择偶标准<sup>①</sup>,男性更关注女性的年龄容貌等外表特征,因此,在婚姻市场中,那些高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在她们所青睐的男性眼中未必具有吸引力。正因为这样,在“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模式以及“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可以得到“婚姻市场不匹配假设”:即高教育、高收入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匹配困难,进而容易成为婚姻市场中“被动单身”贵族。学者对日本的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观点<sup>[9]</sup>。

因此,根据贝克尔的分工交换推出的“经济独立命题”,以及根据“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模式和“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推出的“婚姻市场不匹配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假设1b:

假设1b:经济独立性强与婚姻进入负相关,即经济独立性强女性更可能单身。

## (二)家庭背景与婚姻进入

除了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身的经济能力外,家庭背景也是影响婚姻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学者把影响婚姻进入的家庭背景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sup>[10]</sup>。

主流观点认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婚姻进入负相关,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经济资源越多,其子女更可能晚婚。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社会经济资源多的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降低子女通过结婚逃离家庭的“离巢”倾向;其次,一般而言,在经济条件较好家庭长大的子女更容易养成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对小家庭的经济期望也会相应较高,从而对婚姻进入具有延迟效应;最后,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而言,不管是父辈对子女,还是子辈对自身的教育和职业期望都较高;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也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而教育获得和职业参与都会延迟子女婚姻进入的时间。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2a:

<sup>①</sup>不管是社会学的资源交换理论、心理学的心理进化理论,还是社会学习理论,在择偶问题上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在择偶过程中存在性别差异:即男性看重女性的年龄、外表吸引力和持家能力,女性关注男性的经济能力。

假设2a: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婚姻进入负相关,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女子更可能晚婚/单身。

影响婚姻进入的第二大家庭背景因素是家庭结构。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塑造了儿童的婚姻观念和态度, 并进而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婚姻行为。学者们的研究表明: 单亲家庭对婚姻进入有负向影响, 即与在双亲俱全的家庭长大的孩子相比, 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会延迟结婚甚至不婚<sup>[11-12]</sup>。这主要是因为童年时期在单亲家庭的生活经验和经历的父母离婚变故, 会使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形成比较消极的婚姻态度<sup>[13-14]</sup>; 这种消极的婚姻态度会延迟他们成年后婚姻进入的时间<sup>[12,15]</sup>。因此, 单亲家庭对婚姻进入具有延迟效应。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2b:

假设2b: 家庭结构对子女婚姻进入有影响, 单亲家庭对婚姻进入具有延迟效应, 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子女成年后更可能晚婚/单身。

### (三) 人口流动与婚姻进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日益增多, 这也会对婚姻进入产生影响。但是, 国内外学者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从现有为数不多的研究结果看, 观点并不一致。

有学者认为, 由于离开了原来长期生活的地域, 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原住地的地方性婚姻市场, 再加上对迁入地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会导致流动人口与婚姻进入之间负相关, 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流动人口具有婚姻延迟效应的命题<sup>[16]</sup>。事实上, 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人口流动与婚姻进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独特之处, 本文强调两点: 一方面, 由于跨地域的流动, 大大减小了家庭对个人择偶的影响, 个体晚婚和不婚面对的群体压力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 由于离开原来的熟人关系网络, 流动人口在择偶过程中获得的家庭、亲友等社会关系的支持大大降低, 或者其效用大打折扣。对我国农村妇女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具有延迟效应, 流动女性婚龄大于不流动妇女<sup>[17]</sup>。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3a:

假设3a: 流动人口与婚姻进入负相关, 与常住人口相比, 流动人口更可能单身。

还有学者认为,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通常伴随着教育获得和职业流动, 因而会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 而较好的收入水平具备了结婚所需要的经济资源, 从而对婚姻进入具有促进作用。这种观点也被学者对墨西哥和泰国<sup>[16]</sup>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假设3b:

假设3b: 流动人口与婚姻进入正相关, 与常住人口比, 流动人口更可能结婚。

### (四) 婚前性行为与婚姻进入

在婚姻进入问题上, 人们的选择不仅仅只有结婚与单身, 还有同居和其他伴侣关系。关于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与婚姻进入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可以促进婚姻进入<sup>[18]</sup>。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 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收集更多信息, 了解对方的机会, 解决婚姻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可以降低婚姻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第二, 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越多, 女性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的机会越高。因此, 根据奥本海默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到“非婚性行为的婚姻促进假设”:

假设4a: 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与婚姻进入正相关, 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越多, 越有可能结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与婚姻进入负相关<sup>[19]</sup>, 这种观点强调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并不一定以婚姻为目的, 而只是区别于婚姻的另一替代性选择, 女性参与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越多, 婚姻进入的动机越低。同居等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是结婚的替代性选择, 这种形式的伴侣关系一方面可以获得婚姻的好处, 同时又可以避免婚姻关系所产生的成本和代价。上述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家庭背景、个体特征、教育和职业经历外, 女性婚前性关系和性行为是影响她们婚姻进入的重要变量<sup>[19]</sup>; 女性非婚性行为越多, 她们结婚的概率越低; 这种影响独立于女性的教育程度。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渐趋开放, 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也有所增加。同时, 社会舆论对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的态度也渐趋包容和理解。因此, 在这种背景下, 人们对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的态度与婚姻进入有关, 性观念比较开放的更可能选择同居等非婚性伴侣, 从而降低婚姻进入的动机。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非婚性行为的婚姻替代假设”:

假设4b: 非婚性行为与婚姻进入负相关, 非婚性关系和性行为越多, 越有可能单身/晚婚。

### (五) 工作单位与婚姻进入

对于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工作单位的性质会影响其婚姻状况。对于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部门的人来说, 女性面对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较少的社会福利, 因而她们在择偶过程中更关注对方的社会经济状况。由于其

自身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婚姻的梯度匹配理论, 她们会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更高的男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她们择偶选择的余地。同时, 由于有些工作单位有“外婚制”的潜规则, 如外资企业排除在单位内部寻找配偶, 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择偶的难度。再加上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部门工作时间较长、压力较大,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女性择偶的难度。据此, 我们提出假设5a:

假设5a: 工作单位的市场化程度与婚姻进入负相关,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单位工作的社会成员更可能单身。

另一个方面, 由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工作的员工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 面对转型期社会分化的加剧, 以及由于市场和制度变迁导致的不确定性, 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有较高的吸引力, 因而对婚姻进入具有促进作用。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假设5b:

假设5b: 工作单位的市场化程度与婚姻进入正相关,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单位工作的社会成员更可能结婚。

##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 (一)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完成的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5), 调查采用全国多段随机抽样, 抽样框覆盖除西藏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本文的数据分析按人为权重单位加权, 结果可以推断全国总体。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男女的婚姻状况, 并比较解放后不同年代的青年男女未婚率的差异, 删除1950年前和1980年后出生的人口, 初始样本1274人。

### (二) 变量

本文分析不同因素对婚姻状况的影响, 因变量是婚姻状况, 分为是否结过婚和从未结婚两种情况, 如果从未结婚赋值为1, 结过婚赋值为0。由于数据的调查时点为2005年, 为了比较不同年代的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 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1985年时的婚姻状况为准, 1985年后结婚的赋值1; 出生于60年代的人, 其婚姻状况以1995年为准, 1995年后结婚的同样赋值为1。

以下为自变量。

性别, 男性为0, 女性为1。

年龄为连续变量, 在比较不同年代的人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时, 年龄的计算按不同的方法获得,

对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 年龄按1985减去他们的出生年份获得, 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 其年龄按1995减去各自的出生年份获得, 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人, 其年龄按2005减去出生年份。

户口为类别变量, 城市户口赋值为0, 农村户口赋值为1。

住地为类别变量, 居住地在本市范围内赋值为0, 在户口所在地市外赋值为1。

教育程度为类别变量, 1为初中或初中以下, 2为高中, 3为大专或大专以上。

价值观念为类别变量, 1为观念较为传统, 2为观念中等, 3为观念较为开放。

工作单位性质为类别变量, 1为党政机关, 2为国有企业, 3为事业单位, 4为集体企业, 5为个体经营者, 6为民营或私营企业, 7为三资企业。

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

### (三) 模型

本文对不同年代出生的城乡居民的婚姻状况进行交互分类, 计算相关系数并进行卡方检验。然后对不同年代出生的城乡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进行方差分析。最后, 对城乡居民的婚姻状况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 三、统计结果及发现

### (一) 不同年代出生的城乡居民的未婚率与平均初婚年龄

建国后出生居民的未婚率、平均初婚年龄有显著变化吗?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居民未婚率和平均初婚年龄是否区别于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从表2可以看出, 建国后青年的未婚率呈U型曲线,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1985年时的未婚率为11.79%, 60年代出生的人在1995年时的未婚率为9.00%, 70年代出生的人在2005年时的未婚率为11.85%。卡方检验表明, 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未婚率存在显著差异( $X^2 = 7.5917$ ;  $df = 2$ ;  $P = 0.022$ )。因此, 建国后青年男女的未婚率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根据表3的方差分析的结果, 我们发现不同年代出生的人, 平均初婚年龄存在显著差异( $F = 54.15$ ;  $df_1 = 2$ ;  $df_2 = 3472$ ;  $P = 0.0000$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平均初婚年龄最大, 70年代出生的人次之, 60年代出生的人平均初婚年龄最小。因而, 建国后我国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呈先降后升的态势。

表1 变量的基本分布情况

变量名	1=是		0=否	
	频数/人	百分比/%	频数/人	百分比/%
因变量				
婚姻状况: 未婚	151	11.85	1123	88.15
自变量(类别变量)				
性别(女=1, 男=0)	637	50.00	637	50.00
户口(农村=1, 城市=0)	318	24.96	956	75.04
住地(市外=1, 本市=0)	106	8.32	1168	91.68
初中或初中以下	531	41.68	743	58.32
高中	435	34.14	839	65.86
大学	308	24.18	966	75.82
传统观念	431	33.83	843	66.17
中等观念	437	34.30	837	65.70
现代观念	406	31.87	868	68.13
党政机关	43	3.38	1231	96.62
国有企业	267	20.96	1007	79.04
事业单位	140	10.99	1134	89.01
集体企业	116	9.11	1158	90.89
个体经营	435	34.14	839	65.86
民营企业	230	18.05	1044	81.95
三资企业	43	3.38	1231	96.62
自变量(连续变量)				
年龄	平均值		标准差	
	30.81		2.91	

表2 不同年代出生的  
城乡居民婚姻状况

出生年代	婚姻状况		
	结过婚/%	未婚/%	总数/人
20世纪50年代	88.21	11.79	1145
20世纪60年代	91.00	9.00	1477
20世纪70年代	88.15	11.85	1274

Pearson  $\chi^2(2)=7.5917$ ;  $P=0.022$ 。

表3 不同年代出生的城乡居民的  
平均初婚年龄

出生年代	平均值	标准差	人数
20世纪50年代	24.82	2.97	1010
20世纪60年代	23.56	2.94	1344
20世纪70年代	24.00	2.96	1121
总体	24.07	2.96	3475

$F=54.15$ ;  $df_1=2$ ;  $df_2=3472$ ;  $P=0.0000$ 。

## (二) 不同年代出生的居民未婚的影响因素

不同年代出生的人, 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于相关变量缺乏, 本文主要用性别、年龄、户口和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 分析它们对未婚的影响(表4)。

分析表明, 对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 性别、年龄、户口和教育对婚姻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男性的29%;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未婚发生比在降低, 农村户口居民未婚的发生比为城市居民的50%; 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居民,

未婚率是初中及初中以下者的1.74倍, 高中教育程度者与初中以下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对于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 性别、年龄、户口对婚姻状况有显著影响。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男性的29%;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未婚的发生比趋于下降; 农村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城市居民的45%。出生于60年代的居民, 教育程度对婚姻状况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 性别、年龄、户口和教育对婚姻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男性的42%;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未婚的发生比趋向下降。农村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城市居民的30%; 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初中以下者的2倍, 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显著, 而高中教育程度者未婚的发生比是初中及初中以下者的12%, 但该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通过不同年代的比较, 我们发现, 解放后出生的人中, 与男性比, 女性的未婚发生比趋于上升; 与城市居民比, 农村居民未婚发生比趋于下降; 教育对生于60年代的人的未婚发生比的影响并不显著。

## (三) 70年代出生的居民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

从模型1可以看出, 对于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 不同性别之间的婚姻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男性的43%; 年龄每增加一岁, 未婚的发生比就下降27%; 农村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城

表 4 不同年代的人未婚的决定因素

自变量	模型 I: 50年代		模型 II: 60年代		模型 III: 70年代	
	B	$\beta$	B	$\beta$	B	$\beta$
性别(女性)	-1.228*** (0.212)	0.293	-1.252*** (0.215)	0.286	-0.879*** (0.196)	0.415
年龄	-0.218*** (0.038)	0.804	-0.325*** (0.041)	0.723	-0.321*** (0.037)	0.725
户口(农村)	-0.688* (0.356)	0.503	-0.795*** (0.294)	0.452	-1.202*** (0.323)	0.300
教育 <sup>a</sup>						
高中	0.246 (0.208)	1.279	0.078 (0.225)	1.082	0.112 (0.263)	1.119
大学	0.556* (0.319)	1.744	0.169 (0.266)	1.185	0.698*** (0.264)	2.010
常数项	4.826*** (1.147)		7.735*** (1.734)		7.894*** (1.148)	
Log L	-373.591		-386.921		-383.148	
Chi-Square	83.47		120.18		161.11	
Df	5		5		5	
N	1 145		1 477		1 274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01$ 。a 表示参照组为初中及初中以下。

市居民的 27%; 流动人口的未婚发生比是本地居民的 2.04 倍; 受过大学教育的城乡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初中以下者的 1.87 倍。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对于生于 70 年代的人来说, 性别、年龄、户口和居住地以及教育程度对婚姻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单位变量, 结果表明, 模型 2 比模型 1 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显著地提高了 ( $\text{chi-square}=28.59$ ;  $df=6$ ;  $P=0.0001$ )。从组间比较看, 主要差别存在于外资企业和党政机关之间,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外资企业员工未婚的发生比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6.59 倍。

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从模型 3 可以看出: 农村女性未婚的发生比仅为男性的 30%;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流动人口未婚的发生比为本地的 3.23 倍; 年龄、教育程度和观念的开放程度对农村居民的大龄未婚并无显著影响。从模型 4 可以发现: 对城市居民而言, 性别、年龄、教育、工作单位和价值观念对婚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 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男性的 44%; 年龄每增加一岁, 未婚的发生比是原来的 72%; 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居民未婚发生比是初中以下者的 1.79 倍; 在三资企业就业城市居民未婚的发生比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 11.18 倍; 观念为中等和较为开放的城市居民比保守者大龄未婚的概率更高。对城市居民而言, 居住地是在本地还是外地对婚姻状况并无显著影响。

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对生于 70 年代的城市女性

和男性婚姻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 logistic 分析。从模型 5 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城市男性来说, 他们的婚姻状况主要受年龄、居住地的影响。具体说来, 年龄每增长一岁, 未婚的发生比是原来的 72%; 流动人口的未婚发生比是本地人口的 2.88 倍。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工作单位似乎对城市男性并无显著影响。但是进一步地分析表明, 工作单位对城市男性的婚姻状况有着显著的影响。根据模型 6, 我们可以发现, 除了居住地外, 年龄、教育、工作单位和价值观念对城市女性的婚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说来, 年龄每增加一岁, 未婚的发生比较之原来减少 29%; 具有大学文凭的未婚发生比是初中以下者的 3.24 倍; 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女性, 未婚的发生比分别是党政机关工作女性的 7.86 倍和 38.52 倍; 观念中等的城市女性未婚的发生比是观念保守者的 2.40 倍(表 5)。

#### 四、结论与讨论

国内家庭社会学对婚姻状况的研究中, 主要集中在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这两个主题上, 前者关注在择偶标准问题上的性别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后者则探讨对已经结婚的夫妻双方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匹配程度以及这种婚姻匹配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来说, 目前学界对传媒和舆论关注的大龄青年婚姻进入所面临的困境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点: 1) 建国后, 青

年男女的未婚率和平均初婚年龄都经过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大致呈现U型态势。2)对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城乡居民分别在1985年,1995年和2005年时婚姻状况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虽然女性未婚的发生比都低于男性,但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未婚的发生比均低于城市,但在不同的年代这种差异呈现扩大的态势;年代不同,教育对婚姻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教育对他们的婚姻状况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5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存在显

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存在于大学和初中之间。3)对生于70年代的人来说,性别、年龄、户口、居住地、教育程度、价值观念和工作单位性质对他们的婚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但在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年龄、教育和价值观念对城市居民有显著影响,对农村居民则没有;居住地对农村居民有显著影响,对城市居民则并不显著。另外,价值观念对城市女性的婚姻状况有着显著影响。不管是对城市男性、城市女性,还是对农村居民而言,除了年龄这一人口学变量外,工作单位对他们的婚姻状况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表5 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1		模型2 (城乡)		模型3 (农村)	
	B	$\beta$	B	$\beta$	B	$\beta$
性别	-0.847***	0.429	-0.815***	0.442	-1.195*	0.302
(男)	(0.197)		(0.203)		(0.700)	
年龄	-0.311***	0.732	-0.304***	0.737	-0.154	0.857
	(0.038)		(0.039)		(0.106)	
户口	-1.315***	0.269	-1.332***	0.264		
(农村)	(0.329)		(0.337)			
住地	0.715**	2.043	0.672**	1.959	1.172*	3.230
(外地)	(0.303)		(0.315)		(0.641)	
教育 <sup>a</sup>						
高中	0.038	1.038	0.038	1.039	0.559	1.749
	(0.263)		(0.269)		(0.647)	
大学	0.627**	1.872	0.647**	1.909	1.446	4.247
	(0.267)		(0.291)		(1.568)	
观念 <sup>b</sup>						
中等	0.371	1.450	0.414	1.513	-0.651	0.521
	(0.251)		(0.257)		(0.797)	
开放	0.524**	1.689	0.509**	1.664	0.467	1.596
	(0.242)		(0.249)		(0.665)	
单位 <sup>c</sup>						
国企			0.443	1.558		
			(0.593)			
事业			-0.434	0.648		
			(0.647)			
集体			-0.155	0.856	-2.888*	0.056
			(0.689)		(1.722)	
个体			0.198	1.219	-2.646*	0.007
			(0.610)		(1.381)	
私企			0.667	1.949	-2.351	0.095
			(0.605)		(1.465)	
三资			1.885***	6.586		
			(0.668)			
常数	7.268***		6.680***		4.087	
	(1.176)		(1.390)		(3.557)	
Log L	-377.721		-363.426		-49.655	
Chi square	171.97		200.56		19.49	
df	8		14		10	
N	1274		1274		297	

续表 5

自变量	模型 4 (城市)		模型 5 (城市男性)		模型 6 (城市女性)	
	B	$\beta$	B	$\beta$	B	$\beta$
性别 (男)	-0.811*** (0.216)	0.445				
年龄	-0.329*** (0.043)	0.720	-0.327*** (0.054)	0.721	-0.337*** (0.073)	0.714
户口 (农村)						
住地 (外地)	0.545 (0.377)	1.724	1.059** (0.462)	2.883	-0.605 (0.756)	0.546
教育 <sup>a</sup>						
高中	-0.055 (0.295)	0.946	-0.074 (0.379)	0.929	0.025 (0.481)	1.025
大学	0.586* (0.306)	1.796	0.277 (0.397)	1.320	1.176** (0.508)	3.243
观念 <sup>b</sup>						
中等	0.569** (0.280)	1.767	0.355 (0.372)	1.425	0.877* (0.458)	2.403
开放	0.503* (0.271)	1.654	0.567 (0.345)	1.728	0.602 (0.463)	1.825
单位 <sup>c</sup>						
国企	0.767 (0.665)	2.154	0.401 (0.847)	1.493	1.153 (1.115)	3.167
事业	-0.118 (0.712)	0.889	-0.435 (0.922)	0.647	0.190 (1.175)	1.209
集体	0.092 (0.766)	1.097	-0.138 (0.950)	0.871	0.107 (1.487)	1.112
个体	0.445 (0.688)	1.561	-0.227 (0.889)	0.797	1.423 (1.139)	4.148
私企	1.018 (0.679)	2.768	0.399 (0.872)	1.490	2.062* (1.124)	7.864
三资	2.414*** (0.746)	11.180	1.519 (0.963)	4.566	3.651*** (2.474)	38.519
常数	7.091*** (1.522)		7.692*** (1.974)		5.421** (2.474)	
Log L	-305.569		-180.549		-119.138	
Chi square	170.95		84.53		78.73	
df	13		12		12	
N	956		452		504	

注: a 为教育程度的参照组为初中及初中以下; b 为观念的参照组为传统;  
c 为单位性质的参照组为党政机关。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方面,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解释人们的婚姻进入问题的研究思路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本土化的择偶研究可以从工作单位、性观念和人口流动三个角度进一步挖掘,如果在自变量中增加工作单位和性观念开放程度这两个因素,我们会对婚姻进入问题做出独特的中国情境下的一般性解释:在控制家庭背景和个人经济能力的条件下,工作单位对婚姻进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三资企业工作对婚姻进入具有明显的延迟效应,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和

人口流动对婚姻进入具有阻碍作用。

基于此,我们试图从现代性的视角探索当代青年婚姻进入所面临的困境。在讨论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同时,吉登斯认为就现代制度而言,无论其动力,侵蚀传统风俗的程度及其全球性的影响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异,因为它不单是一种外在的转型,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sup>[20]</sup>。从这个视角理解现代性,我们就会发现,它与个体的生活、自我和自我认同直接交织在一起。



在本研究中,工作单位的性质、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和人口流动从总体上看,都是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制度对中国传统观念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身体的现代化与心灵的传统内核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首先,在现代企业中,以“三资企业”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强调竞争和效率,“企业不再办社会”,企业不再承担“人的再生产”这部分成本,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劳动者流动性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事实上,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遮蔽了社会结构性和制度化的设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剧烈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全面市场化,标志着国家福利锐减,社会保障缺乏和不平等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居民凡事依靠自己、父母和家庭的程度达到1949年以来的最高程度<sup>[21]</sup>。

其次,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长年的战争和社会

动荡,在此以“民族”和“国家”为话语主导过程中,女性解放所针对的目标不是男性,而是旧的家庭和政治体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在其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妇女,但国家通过“解放妇女”完成了对妇女的全面控制<sup>[22]</sup>。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影响<sup>[23]</sup>。而性观念开放程度高低与婚姻进入间的逆向约束是两性,尤其是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女性身体解放的代价?是女性地位提升的代价?市场化改革是否将女性从国家那里“解放”出来,转而抛给了市场?与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大陆出现过四场“妇女回家”的论争一样<sup>[24]</sup>,近些年媒体与学界热议的白领阶层的隐婚、城市女性日益升高的不婚、不育,是工薪阶层,尤其城市白领面对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制度约束和压力,所做出的貌似非理性的理性选择。

### 参 考 文 献

- [1] Kincaid O V.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563-591.
- [2] Goldstein J R, Kenney C T. Marriage Delayed or Marriage Forgone? New Cohort Forecasts of First Marriage for U. S. Wome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 506-519.
- [3] 李煜. 婚姻的教育匹配: 50年来的变迁[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3): 73-79.
- [4]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 813-846.
- [5]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 11-26.
- [6] Blossfeld H, Huinink J.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or Norms of Role Transition? How Women's Schooling and Career Affect the Process of Family Form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7: 142-168.
- [7] Thornton A, Axinn W G, Teachman J D.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Enrollment and Accumulation on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Early Adulthoo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 762-774.
- [8] 易松国. 从择偶梯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3): 77-81.
- [9] Raymo J M, Miho I. Marriage Market Mismatches in Japan: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 and Marria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5, 70: 801-822.
- [10] Thornton A. Influence of the Marital History of Parents on the Marital and Cohabitation Experiences of Childre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6: 868-894.
- [11] Kobrin F E, Waite L J. Effects of Childhood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Transition to Marriag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84, 46: 807-816.
- [12] Clarkberg M E, Stolzenberg R, Waite L. Values and the Entrance into Cohabitation[J]. *Social Forces*, 1999, 74: 609-634.
- [13] Trent K, South S J. Sociodemographic Status, Parental Background, Childhood Family Structure, and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Formatio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2, 54: 427-439.
- [14] Axinn W G, Thornton A.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arital Dissolutions on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Formation[J]. *Demography*, 1996, 33: 66-81.
- [15] Sassler S, Schoen R. The Effect of Attitudes and Economic Activity on Marriage[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9, 61: 147-159.
- [16] Aree J. How Does Leaving Home Affect Marital Timing? An Event-History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Nang Rong, Thailand[J]. *Demography*, 2006(4): 711-725.
- [17]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2): 61-65.

- [18] 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563-591.
- [19] Monica G. The Substitution Hypothesis: The Impact of Premarital Liasons and Human Capital on Marital Timing[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 64: 407-419.
- [20]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 赵旭东, 方文,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
- [21] 孙沛东. 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白发相亲”现象探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 [22] 李小江. “男女平等”: 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失与得[J]. *社会学研究*, 1995 ( 1 ): 92-97.
- [23] Farrer J C.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24-43.
- [24] 宋少鹏. “回家”还是“被回家”? ——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 4 ): 5-12.

## A Modern Dilemma in Marriage Inception

*SUN Pei-d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Western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of marriage inception. In China, however, more factors than these two are involved in this problem: work place, sex prefere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etc. The paper posits that, given equal family background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most obvious influencing factor in marriage inception is one's workplace. More specifically, people who work in foreign enterprises or joint ventures, marriage inception is usually delayed, while people are more open-minded in terms of sexu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marriage inception; nature of work place; sexual preference; migration; modernity

(责任编辑: 贾 宜)